

梁艳芳 著

自述、代述与混合叙述



——
一种纪实伦理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述、代述与混合叙述



——
一种纪实伦理的研究

梁艳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述、代述与混合叙述：一种纪实伦理的研究 / 梁艳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1

ISBN 978 - 7 - 5161 - 8421 - 9

I. ①自… II. ①梁… III. ①纪实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82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特约编辑 薛敏珠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郑州大学基础与新兴学科资助项目

目 录

引言	(1)
第一节 “反右”书籍热与当代文化现象	(1)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从虚构到纪实	(10)
第三节 对复杂历史经验的不同处理方式	(18)
附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反右”作品大略	(34)

上篇 自述与自我经验

第一章 何谓自述	(41)
第一节 自述即自我建构	(41)
第二节 反思性——自述的叙事伦理尺度	(47)
第二章 坦白、自省与忏悔	(53)
第一节 坦白叙事的可能与边界	(53)
第二节 自省叙事及其效果	(76)
第三节 忏悔的纯度、向度与深度	(99)
第三章 悲情与诉苦	(109)
第一节 悲情诉苦：当前“反右”叙述的主流叙事模式	(109)
第二节 “控诉”还是“叙述”：悲情诉苦中的“具体” 与“节制”	(113)
第三节 苦难不是历史的全部	(122)

第四章 伦理之美与美之遗憾	(127)
第一节 祈祷与超越：面向“不在之在”的希望	(128)
第二节 浸润与自由：灵魂在大地的复苏	(132)
第三节 爱恋与敬惜：美到极致乃是一种伦理的显现	(136)
第四节 质疑与思省：“无懈可击”还是“自我隐瞒”？ ..	(140)

第五章 自我经验的出场及其困境	(144)
第一节 “说”还是“不说”：自述者的境遇伦理	(144)
第二节 信任或质疑：自述读者的接受伦理	(151)
第三节 经验遮蔽与言语迷失：自述的伦理困境与展望	(154)

下篇 代述、混合叙述与他人的经验

第一章 何谓代述	(163)
第一节 引入代述概念的必要性	(163)
第二节 客观性——代述的叙事伦理尺度	(169)

第二章 史料展示、口述实录与转述	(172)
第一节 史料展示中的历史踪迹	(172)
第二节 口述中的历史记忆	(177)
第三节 语式、语态变换中的转述伦理	(183)

第三章 代述话语的语用伦理特征	(200)
第一节 质朴、素净与克制	(200)
第二节 原述的“再口语化”	(202)
第三节 原述的“再细节化”	(206)

第四章 代述者伦理	(209)
第一节 代言人姿态与代言对象的选择	(209)
第二节 有效介入与合理规避	(214)

第三节 代述者的伦理困境：对代言合理性与代述可靠性的质疑	(220)
第五章 混合叙述：自述与代述的结合	(225)
第一节 自述与代述两种叙述方式的混合使用	(225)
第二节 复合视角下的混合叙事	(230)
结语 几个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249)
参考文献	(262)
后记	(277)

引 言

第一节 “反右”书籍热与当代文化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8年以来，中国图书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批与知识分子历史人物、历史史料及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解禁书籍”，一时成为图书出版界引人注目的文化焦点。其中，与“反右”运动相关的著作尤其多，已成为“解禁书籍”热点中的热点。如对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的汇编整理、对“反右”运动始末与成因的探讨。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量个体视角的创伤性叙述，已深入“反右”运动及其后的历史反思，其中又以纪实类作品居多（详情可以参见引言附录部分的三个表格）。这些纪实作品，既可以看作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记忆与回望，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同历史的冲突与对话。其中，聚集着多种冲动与情绪，质疑与思省，清算与倾诉，对历史的解构与重构，对自我的辩解与忏悔，对历史的困惑与执着的探寻、求索，构成了一个极为沉重而复杂的话语场域。

一 “反右”书籍热的成因探析

“1957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中一度是意识形态禁忌的界标。始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拨乱反正并没有从根本上跨越“1957年”。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文如无特殊说明，均简称《决议》）对“反右”事件做出了明确定性，认为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

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①《决议》对“反右”运动的定性，实际上也是对“反右”历史叙述边界的一个划定，之后关于“反右”事件的叙述与反思始终没有越过这一界限。也正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反右”书籍热现象才尤其值得关注：继80年代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之后，为什么在90年代中后期会再次出现“反右”叙述的高潮？

贺桂梅在《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与“反右”相关书籍的文化分析》一文中，运用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法，从文化生产机制的角度，以较客观的描述，对1998年的“反右”书籍热现象进行了细致分析。贺桂梅认为促成这次“反右”书籍热现象的原因在于：①世纪末特有的时间焦虑带给渐已老去的当事人一种抢救历史、重建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的道德冲动；②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控制的适当解压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③“反右”书籍潜在的揭秘性暗含的市场价值对消费意识形态现象的推动等。通过对这些成因的透视分析，贺桂梅认为这批作品的出版实际上展现了各种历史记忆、政治诉求与官方说法之间的话语争夺战，各种力量的争夺、妥协与共谋又揭示出不同记忆主体对历史与现实的不同阐释和想象，甚至在某类记忆主体内部也无法做到完全同质化的理解，而她就是要在这种种差异与对立中发掘各类记忆被生产或再生产的动力机制。

这篇文章分析详尽，某些观点也极具启发性，是运用文化分析方法细读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的有益尝试。但是贺桂梅的分析，更多偏重于外部文化生产机制，对这一现象中“反右”历史叙述主体自身复杂性与差异性的分析略显不足；此外，这篇文章写于20世纪90年代末，而在从那时起之后的十余年间，关于“反右”的叙述热潮并未完

①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http://www.doc88.com/p-946603802569.html>）。

全消歇，新的现实语境也必将会为理解这一文化现象提供新的角度与立场。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言说主体的独立性来说，独立叙述主体的渐趋形成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反右”书籍热的成因之一。所谓独立叙述主体指的是，叙述主体在精神指向与“存在决断”^①上，不依附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有自觉独立的主体意识；有回到自身的写作意识；有独立自由的话语抉择能力以及属己的语言和言说方式。这两方面，一个指向主体自身，一个指向语言，二者缺一不可：语言作为“存在之家”，必定含有一定的历史与精神内涵；而主体自身，缺少属己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它所携带的复杂经验就难以内化为真切的个体经验被切实叙述出来，更勿谈向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的转化。因此独立叙述主体的形成对于反思历史、建构自我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出于“社会教化系统整合的需要，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曾树立了一系列人格范型和人格规范，要求个人对此作出承诺”^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由个体亦即责任个体的缺乏，以及个人存在的被否定与人的历史性荒芜。如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造成了他们独立人格的丧失，也破坏了他们属己的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存在语境中，独立叙述主体一度处于稀缺状态。而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热”“新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日趋多元化、日常化、个人化，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与借鉴为人们提供的新的思想参照、话语资源及社会氛围，以及知识界在时代新境遇中对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与文化领域内各种思潮与现象的深入反省，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具有反思、审视与言说能力的独立叙述主体的形成。90 年代以来的“反右”书籍热可以说正是这一过程的伴生物。

其次，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状况的反思也

①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72 页。

② 王鸿生：《无神的庙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8 页。

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90年代以来的“反右”书籍热。80年代的“知识分子”热，曾一度唤起知识分子强烈的精英意识、启蒙情结和社会责任感，但随着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热潮渐渐冷却，知识分子一度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挤出局，处于边缘状态，并陷入身份危机与精神困境中，这种种状况使知识分子们开始对自身的精神与道德状况、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反省，同时也激起了他们重塑自身形象以重获国民与社会的认同，以及重返体制中心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强烈愿望。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及“顾准热”“陈寅恪热”“西南联大自由知识分子热”等现象的出现与此也不无关联。一批具有鲜明个体意识与自由意识、面对暴力性的历史敢于维护思想尊严与正义良知的思想者形象被树立起来，并成为知识分子重塑自我的样板。这种思想与意识深处的渴望与追求实际也成为知识分子在90年代重新叙述“反右”的一个自我期待和动力。在这些作品中被树立起来的具有良知与正义感、具有忏悔与反省意识的“文化英雄”，如巴金、韦君宜、邵燕祥等，对于重新打造知识分子形象、重塑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认可和信心，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反右”书籍热的出现与这一思想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最后，9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日趋深入的反省，也是促成“反右”书籍热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80年代末，在现代化理论进入中国伊始，一些敏锐的学者就开始试图借助这一“武器”来反思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程，并将“反右”“文革”看成是这一坎坷历程的重要关节点。进入90年代以后，伴随着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扩张，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现代性规划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这种状况下，持各种政治主张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自觉地重返历史现场进行反思，并试图为现实寻找新的解释或出路。对3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与6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审视与梳理，也逐渐成为知识界与思想界热衷研究与探讨的话题。在这种背景下，对历史记忆问题的关注与对历史失忆问题的提醒，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写作的重新发掘、对历史创伤记忆的深入研究以及关于未来中国发展

的设想等问题，也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对于言说、反思“反右”这一曾经的政治暗礁也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反右”书籍热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既受制于外部文化生产机制，又与叙述主体的内在精神与思想状况分不开，而且由于言说语境的变化，当下对“反右”事件的关注，与对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与省察也分不开，这显然是进入“反右”叙述与思考的一种新的路径，由此得出的结论与探寻的思想资源也定会存在差异。如果说90年代之前关于“反右”的叙述更多强调的是这一事件在民族、国家及个体层面所体现的灾难感与悲剧感，在新的语境中当人们从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视野来审视这段历史时，则开始认识到历史与叙述本身都存在着多重面相。这种认识的推进也显示出对“反右”书籍热现象的研究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问题场域，而如何穿越其中来形成自己的认识、判断与表述是对研究者真正的考验。

二 解码“反右”书籍的“纪实热”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反右”书籍热中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这批关于“反右”的历史叙述中，纪实类作品最多，其次为研究类与史料类，虚构类叙述最少（详情可以参见引言附录部分的三个表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又该如何解释与看待这种“纪实热”现象？

首先，笔者认为，“反右”书籍的“纪实热”现象并不是孤立的。90年代以来，在很多领域都出现过“纪实热”的现象，如影视界的“纪实片运动”，社会学领域“口述实录”形式的广泛应用，文学领域也一度兴起过“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的热潮，而“新写实小说”与“日常化写作”的出现与此也有关联。这众多领域的“纪实热”现象集中出现，首先与80年代以来主体意识的崛起有关。吴秀明就曾指出：“纪实文学的兴起，从表层来看，意味着文学创作的一种思维方法、叙述方法和表现方法的革新；但其深层意义则反映了人们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关注，对人的个体深层心态的关

注，这是人作为‘人’的尊严意识、主体意识、自我意识觉醒和日趋成熟的标志。”^① 这一点在 90 年代中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90 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在人们的精神与日常生活中的淡出，以及西方后现代诸种哲学与理论的引进和传播，“日常生活”与“物质世界”日渐成为人们关注与思考的对象，面向自我、面向事物本身成为人们深层的社会心理，最真实、最直接地反映当下多元化的日常生活的原生态面貌，尤其是处于底层、边缘与弱势群体的生活世界的原生态面貌，成为许多人体认现实处境最有效与最便捷的方式。其实，无论是在影视领域还是社会学或文学领域，许多人都在努力而自觉地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当下中国现实与历史的真实记录与文献见证，并希望借此带动人们给予社会现实更多的关注与思考。如纪实片《安阳婴儿》《铁西区》；纪实文学《中国底层访谈录》《一百个人的十年》等。这种精神导向为在 90 年代以纪实方式反思与叙述“反右”提供了一种社会氛围或场域性的影响。

其次，“反右”叙述“纪实热”现象的出现也与这些作者的叙述能力有关。在这些作者中，很多人并不是专业的写作者，对他们而言，依据事实原初的面貌，以直白的语言来加以呈现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当然其中也有专业作家或诗人，如巴金、邵燕祥、韦君宜、丛维熙、杨显惠等，而且有些人还曾在 80 年代以虚构方式叙述过“反右”经历，如丛维熙、王蒙。但在 90 年代以后，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也普遍采用了纪实性的文体。这种选择和转变，一方面是因为这批作者大都已到了通过写回忆录或自传来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年龄；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叙述能力的有限，这一点在本书作者来看，或许更为重要。对类似“反右”这样敏感且复杂的历史经验来说，在当下有限的社会空间内，以“讲故事”的形式在宏大历史背景中实现真正的个人经验叙事，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仍然是一道难题，历史经验主体在把个体经验结构化、个体化的过程中

^① 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2 版，第 291—292 页。

仍然会面临诸多困难，这一困境也促使他们转而以较为直接与朴素的纪实方式进行叙述。

最后，对纪实文体表现力的自觉与对“反右”题材的深度理解，也是理解“反右”叙述“纪实热”现象的重要维度。对许多人来说，当现实足够丰富和沉重的时候，虚构何堪？在他们看来，“反右”历史在许多时候是虚拟的形象再现，甚至想象都难以企及的，因此，纪实叙事或许是再现和还原如此沉重与复杂的历史的最佳文体选择，有着传统的虚构类文学难以替代的权威性、直接性和影响力。比如杨显惠、赵旭等非亲历性作者，其实拥有更多选择虚构创作的空间，但他们却都倾向于纪实叙述，只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才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改变。如《夹边沟记事》虽然融有小说笔法并冠以“小说”名义出版，但这在某种层面上只是作者为作品的顺利出版而实施的一种出版策略；而赵旭的长篇小说《风雪夹边沟》也是由于最初写成的纪实文本难以出版，才不得不做出文体上的改变。因此，对纪实文体表现力的认可，以及对“反右”题材特殊性的强调，也是“反右”叙述“纪实热”兴起的原因。

除此之外，在这批纪实叙事中，很大一部分是回忆录，特别是由亲历者自述完成的个人回忆录。这一点似乎很容易解释，这批作者大多经历坎坷，到90年代中期时，大多已到了写作回忆录或自传来总结自己一生的年龄。因此，伴随着世纪末的来临，在时间与责任的双重焦虑中，很多人便选择了写回忆录的方式来反思人生与历史。正如贾植芳所说：“老年人喜欢忆旧，喜欢回头看，因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随着体力与精力的日趋衰退，做事情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触面就越来越缩小了，和复杂纷纭的广大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而和自己的主体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在这种窄小的生活气氛里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沉湎在记忆中，从记忆里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即是‘我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之类。这倒不是要学时髦做深刻状，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实在太复杂了。近百年来，在这种历史的

震荡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①

对现代文学史中回忆录创作史的回顾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现象。

现代文学史上，回忆录创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的传记文学，特别是当时一些学者或文化名人的自传，如胡适的《四十自述》、郁达夫的《达夫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林语堂的《林语堂自传》等。这些作品，多是展示传主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既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又具有一定的历史与社会价值；它们的出现既与“五四运动”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与启蒙主义思潮相关，也与二三十年代个性解放逐渐向社会解放转换、启蒙思想逐渐为社会解放思想替代的政治文化现实相关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这些作品从总体来说多属于个人自发行为，没有共同创作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回忆录，特别是革命回忆录开始大量出现，如《把一切献给党》《在烈火中永生》《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其撰写形式也由二三十年代自发的个人书写逐渐演变为“由庞大的写作主体组成的集体性创作运动，参与者包括工人、农民、普通军人、高级干部等”^②。但在这种貌似多样的写作背后，“无作者”文本是“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说，作品不是以某一个人名义写作完成，而是集体分工协作的结果。而且在作品中，个人的历史也往往被整合进国家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属于自我的生命经验常常不留痕迹或干脆退场。这是由于革命回忆录在当时的文学建设、文化建设与政权巩固中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即要

^① 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第4页。

^② 潘盛：《集体记忆的改写和重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学生产策略》，《南都学刊》2008年第5期。

通过“讲述革命起源的神话，构筑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①，为刚刚取得政权的新生国家建构民族与公共的记忆，并为其合法性做出证明。而通过对历史有选择的放大、缩小或掩盖，通过对个人史的遮蔽、整合或删改，革命回忆录实际成为表达权力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对个人与历史都缺乏深入、自觉的反思。

与此相比，90年代以来的“反右”回忆录虽然也有“存史”或“做见证”的意图，但由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出，个人亲历的切身历史经验，如个人的苦难与积怨就有了一定的表达空间。同时，强调个人史也并不是对个人生活的简单回顾，而是试图将个人经验与历史经验结合在一起，使经验主体能够真正以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的身份来呈现与反思这一段历史，并以此作为后人阅读历史的窗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90年代的“反右”回忆录、特别是亲历者的回忆录，不仅是在试图重写这段历史，也是在努力恢复、建构叙述者历史见证人与在场者的身份。这也是90年代的“反右”回忆录与“十七年”革命回忆录的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些“‘个人回忆叙述’是一种杂合性的话语形式，它既有一些历史的真实记载，又不必受制于正规历史学的严谨方法要求”。^②“它是一种个人的写作，不象国家官僚话语的‘正史’那样被严格定调。它不需要为政治正确而牺牲真实回忆”。^③它的“真实可信几乎完全出于‘无须说谎’的推导”^④。“这些个人见证的叙述中有历史、有故事，能取信于读者，又能打动他们的感情，是最能帮助构建反右的叙述形式之一。尽管不同的回忆中，‘历史’和‘故事’的成分搭配不同，许多这样的回忆录涉及的是高层民主党派人士或高层知识分子，如《往事并不如烟》和韦君宜的《思痛录·露莎的路》（其中有专门回忆反右的一章，题目是《从反丁、陈运动到反右风涛》）。有的则是反右时并不出名者的

① 潘盛：《“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的历史叙事与公共记忆》，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第12页。

② 徐贲：《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

③ 同上。

④ 同上。

自述，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这些作品往往以文字优美、思想真诚打动读者，比单纯的真实内情历史更能打动人心，引发创伤记忆。”^①

如此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见证不仅代表一种实录的写作方式，也代表一种具有言说资格、言说合法性与言说权威性的写作身份。“历史见证人”这一名称本身，就是具有现在进行时特征的描述性语词，它表明，作为历史在场者的作者，拥有做证历史的权利，并且正在做证着历史。由于历史不能自语，只能因为见证人的做证而存在，因而他的出场对于弄清、甄别事件本身，对于修正、拟训历史记忆与想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90年代的回忆录不仅是要呈现一个见证者所实录的历史，也是要通过见证者见证历史的行为本身，如实录与反思，通过对作者“历史见证人”身份的强调，为语词之外非语言状态的见证行为提供合法依据。由于见证者对历史的见证，总包含有当下的现实立场与政治诉求，他在有意或无意地遮蔽、疏漏甚至遗忘中有选择、有鉴别的“实录”，总是会留下见证历史的盲区。因此在回忆录中对见证人身份的强调背后是对确立言说合法性的话语权的强调。笔者认为，只有了解这些，才能够更加理解80年代的“主体热”、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等现象同“反右”叙述的“纪实热”之间的关联。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从虚构到纪实

一 “历史中的个人”与“个人中的历史”

“反右”虽然一度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敏感话题，但长久以来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与反思实际上从未间断过。可以说早在“反右”运动期间，在一些右派与“漏网右派”的“思想罪证”中就已初具反思萌芽，当然，形成潮流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主要是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代表。但是由于当时适合深度

^① 徐贲：《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